

学习

活页文选

XUEXI HUOYE WENXUAN

- ③ 明理 切实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
- ②② 张占斌 战略性有利条件与中国经济韧性
- ②⑨ 韩喜平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 ③⑨ 孙来斌 把握稳中求进的方法论

ISSN 2095-0888



中央宣传部主管
《党建》杂志社主办

2022年5月20日出版



切实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

明理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优势,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作出我国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即“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显著优势的精辟概括和深刻阐释,具有鲜明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色,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重大论断,切实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

件”，对于我们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深刻把握“时”与“势”，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历史自信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极为宝贵、稍纵即逝。抓住发展机遇、用好有利条件，就能赢得战略主动，乘势而上，事业迎来大发展；抓不住发展机遇、用不好有利条件，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逐渐落后，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我们党做决策、定规划，历来高度重视对发展环境，特别是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判断。早在2002年，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作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再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客观看，我国发展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国内外

形势大局较之以往更为错综复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面临越来越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在这样的关键档口，“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重大论断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时”与“势”，把党的意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时代发展脉络相统一，基于客观分析当前中国所处内外环境的新形势新变化、科学研判未来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中国稳步推进和平发展以及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信心和能力，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和科学判断，把我们党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把握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充分认识并抓住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就要克服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错误观点或模糊认识。比如，有人认为，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等特点，机遇期的出现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遇而不可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作用使然，是搭了经济全球化“顺风车”的产物。

但是，凡认真研究过历史和现实的人，就不难发现“搭车论”者的荒谬之处：他们忽视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把对“时”与“势”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简单归结为侥幸和运气,缺乏在广阔时空坐标之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整体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发展中,在似乎是偶然性起支配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是必然性起着决定作用,并制约着偶然性的作用形式及其变化。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与兴衰交替,乍看好似零散、偶然的个体叙事,但我们如果将碎片化的事物事件拼接起来,就不难发现其背后发挥必然性作用的历史规律,即不断前进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大航海时代远洋航行的发展,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当今世界蓬勃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一次又一次的战略机遇与产业革命相关联,伴随生产力发展而涌现。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战略机遇期具有客观实在性,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总体上是机会平等的。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 and 民族也会逐渐落后,进而被后来者反超。这一规律,也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再证明。

15世纪至近代,中国错失三次战略机遇期,最终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朝中叶,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创造了工业文明模式,而中国则在经历郑和七下西洋壮

举后闭关锁国,错失发展良机;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中国则陶醉在封建社会的落日余晖之中,马克思称这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清朝后期,中日两国同样面临内忧外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崛起,而中国封建王朝则在洋务运动失败后走到历史的尽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抓住三次战略机遇期,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既站稳了脚跟,也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争取了外援;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紧扣时代主题,科学研判国际大势,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推动中国发展进入快车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从率先有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传播,到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冬残奥盛会,抓住并用好战略性有利条件,推动中国不断释放更加强劲的发展活力。

事实充分证明,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的。把握住战略机遇期,就能够对国家前途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的影响。而能否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战略智慧与政治决断。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是深刻总结党和人民奋进历程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我们开创未来的科学指引。

2.辩证看待“变”与“不变”,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战略定力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的政党,始终从战略高度指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从战略层面构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在重大关头总是能够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课题,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这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发展进程中面临许多新的风险挑战。越是环境复杂,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战略定力,不为杂音噪音所扰,充分看到战略性有利条件,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用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唱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杂音噪音不绝于耳。2015年1月,德国《经理人杂志》以“盲目的中国亢奋时代已经结束”为题,刊文称中国不会崩溃,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现实的场景。还有学者和国际机构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延续时间长短的例证,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周期难以超过40年”的结论。例如,他们发现日本经济较快增长的时间周期为36年,韩国为35年,新加坡为33年。而这三个国家是二战后经济增长周期延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而且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据此,他们认为中国40多年的经济较快增长已经“超周期”了,不仅后面增长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上升“窗口期”已过,“此花开尽更无花”,今后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但是,我们以科学方法论来审视,就会发现“过时论”的论调错就错在,没有以全面、发展、辩证的眼光来分析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中的“变”与“不变”,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新特征视而不见。要看到,与21世纪初相比,虽然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大势未变:自“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论断提出以来,当初的一些历史条件,有的继续存在,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有的已经发生变化,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有的是出现了一些新变量,如经济全球化正遭遇逆风和回头浪,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盛行。但这些条件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逻辑与本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新特征。

——战略机遇期的内生性增强。对中国而言,过去战略机遇期的生成,外生性是首要特征。例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收获了广阔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9·11”事件使国际恐怖主义和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冲突对抗成为当时国际矛盾的焦点,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国成为大国对抗的主要目标,国际环境出现相对有利于中国的一面。今天,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许多新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中美关系成为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但与此同时,经过长时期的接续奋斗,我国经济总量较21世纪初有了巨幅增长,尽管目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放在全球仍是高增速,而且增长规模巨大。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发展机遇逐步实现了由外生性机遇向内生性机遇的转变。相比之下,这些发展条件的积累和变化,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偏重外向型经济体当时所不具备的。

——战略机遇期的可塑性增强。战略机遇期从来就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基于自身积极作为、努力争取的,是可以通过积极塑造而不断得以维护 and 发展的。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主动运筹,着力塑造有利战略态势。伴随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不断扩大,更有能力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战略视野不断拓展,不仅看到外部环境变化对自身的影响,也看到自身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发展本身就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中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共享性增强。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充满风险挑战,但也会催生新的机遇。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世界的发展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发展和利益上的共享性显著增强。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但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同时,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

中的绝对优势不断弱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发起创办亚投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总之,“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不变”的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延续、塑造、拓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完善自己,在发展自己中更好肩负起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3.准确认识“危”与“机”,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内生动力

越是关键时期、重要节点,越要在战略上作出准确判断、进行科学谋划。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的时代方位、站在新的历史关口,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环顾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放眼全球,这个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乌克兰局势风云变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在这样的国情、世情大背景下,鲜明提出“五个战略

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

战略性有利条件,意味着不是一般性的有利条件、不是一时半时的优势,而是对于发展全局、长远走向有着关键影响的主要有利条件。

但是也有少数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面对国内国际的复杂变化,出现一些焦虑情绪,认为“与其说中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毋宁说中国已经进入战略风险期”。

持“中国风险论”者,有的是面对美西方挥舞霸权大棒、对我遏制打压围堵无所不用其极害怕了,认为一些曾经充满机遇的市场对中国关闭,一些“卡脖子”技术难以突破,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有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悲观了,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严重,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触即发,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所谓“中国社会风险”心慌了,认为中国虽然物质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但社会成熟度不足,社会利益分歧多、共识少、阶层诉求不一,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等等,不一而足。

的确,今天的人类正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疫情全球蔓延,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流。但是,虽然面临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等同于中国进入了所谓“战略风险期”。恰恰相反,中国是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的最大确定性因素。

我们冷静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已经进入战略风险期”论调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看到“危”与“机”总是共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而“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提出充分表明,中国拥有临危不乱、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核心优势和强大实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揭示的:“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永葆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拥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定决心和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的坚强意志,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是我们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定海神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容应对惊涛骇浪的

根本保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抵御风险能力是检验一个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着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全国一盘棋的组织优势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彰显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坚定的贯彻执行能力、活跃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我们应对风险挑战、赢得战略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

——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是稳中求进的压舱石。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尽管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这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

——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厚植发展根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外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人民群众安全感逐年上升,2020年达98.4%,2021年上半年达98.56%。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幸福的中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国际知名民调机构2020年统计表明,感到非常幸福或比较幸福的中国人比例高达93%。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和睦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增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

——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激发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新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精神世界以崭新要素与时代风采。一方面,我们党把创新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后发优势、大国优势、制度优势、思想优势、人心优势等综合优势相辅相成、叠加放大;另一方面,针对美西方全方位、无底线、变本加厉的遏制打压,党领导人民发扬斗争精神、善用斗争谋略、提高斗争本领,赢得尊严、赢得主动,切实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未来发展开拓了新机遇。

我们深刻认识到,前进的道路绝不会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新时代新征程上,只要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全面把握“危”与“机”的辩证关系,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

和创造机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充分发挥自身实力和潜能,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4.科学统筹“稳”与“进”,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行动自觉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连接起历史、现在与未来,既回答了新时代我们为什么成功,也揭示了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要求我们必须运用战略思维观大势、谋大事,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放眼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也要看到,伴随机遇共享性的增强,风险传导性也在增强,我们前所未有地置身于机遇与挑战交织、光明与黑暗同在、有利与不利并存的矛盾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们要全面、辩证地理解稳中求进的深刻内涵,理解稳是大局,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这也启示我们,在准确把握“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充分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存在的同时,切忌骄傲自满、盲目乐观。不可忽视的是,与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悲

观论”相伴相生,“盲目乐观论”也在一定范围、特定群体内滋生蔓延。这其中既有对形势观之不明,也有别有用心刻意制造的“自大腔调”,从中可以看出,唱衰与捧杀,向来是一些人操弄舆情、误导公众的一体两面、正反两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深陷“新平庸”困境。反观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特别是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更成为全球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以此为据,一些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进入焦虑期、迷茫期、崩溃期,“历史的火炬正从西方传给东方”,并由此得出结论,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机遇远大于挑战,强调风险挑战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

面对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限施压和全面“脱钩”威胁,一些人主张顺势操作,认为我国只需专注自身发展,安全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迎刃而解;只要深耕国内市场,风险挑战便可在“国际熔断”中自然化解。这种对风险困难采取视而不见的盲目乐观论调,有百害而无一益。我们应该冷静分析形势,不可盲目自满,慎言“自己厉害”,科学统筹“稳”与“进”,更好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

——应当看到,我国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必须要有充分的战略耐心。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之际,在我们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能力和信心之时,充分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我国创新能力仍不能有效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均GDP虽已突破1万美元,但仍大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离高收入门槛还有差距。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摆在优先位置,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应当看到,面对世界性发展危机,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加强高超的战略谋划。尽管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中等收入人群持续扩大,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但也要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进行战略谋划,就要深入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深入把握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长期趋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在支持

和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应当看到,大国崛起绝不可能轻轻松松、一帆风顺,必须具备坚定的战略意志。我国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是两难多难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例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但也存在差距继续拉大的风险;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动力,但也存在转型不畅、经济失速的风险;抗疫斗争增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制度、文化和治理的认同,但也存在被“甩锅”抹黑的风险。我们要充分估计困难,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以打好持久战的强大战略意志,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沉迷于夸奖与赞美,容易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陷阱。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不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影响,或落入圈套,或被带偏节奏。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真正把稳中求进作为工作的总基调,在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社会的稳定程度、资源环境的可承受度之间找到平衡,当稳则稳,宜进则进,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情况想全想透,把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确保安全、顺畅、可靠、稳固。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刻,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作出我国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表明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彰显继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的必胜决心。我们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拨开思想迷雾,凝聚发展共识,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把“关键变量”转化为“确定增量”,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踔厉笃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选自 2022 年 4 月 25 日《光明日报》)

战略性有利条件与中国经济韧性

张占斌

战略问题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会蓬勃发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即“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这既是对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经验启示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显著优势的精辟概括。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影响的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发展遇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越是环境复杂,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战略定力,不为杂音噪音所扰,充分把握用好战略性有利

条件,发挥好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的优势,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蕴含着深邃思考,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大逻辑,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带领人民走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是我们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定海神针”。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流砥柱和中国人民主心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抵御风险能力是检验一个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着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全

国一盘棋的组织优势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能够为共克时艰凝聚磅礴力量、为赢得战略主动提供坚实保障。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不断发展完善各方面制度,提高制度执行力,切实发挥制度优势的强大效能。

三是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3.9万亿元提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达到12551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这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依托。我们坚信,有了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就有经济发展的韧性和空间,就有应对百年变局、推动改革创新的信心和底气。

四是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从历史演进实践看,我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社会治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长期稳定、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为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五是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从百年奋斗实践看,走自己的路、自信自强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服艰难险阻、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基因,是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百年党史中汲取营养,增强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推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不断成为现实。新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精神世界以崭新要素与时代风采。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继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以更加自信自强的饱满精神状态,续写中国经济发展辉煌。

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

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比如,有效需求不振,市场预期偏弱;供给面临制约,部分行业企业困难加大;重点领域风险有所上升,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等等。在看到困难的同时,更要看大局和基本面。从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增速基本稳定,发展质量效益有所提高,

宏观经济大盘和经济治理能力经受住了“压力测试”，经济持续恢复态势没有改变，发展潜力大、韧性足的特点仍然突出，压力困难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需要深刻认识的是，前进的道路绝不会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新时代新征程上，伴随机遇共享性的增强，风险传导性也在增强，我们前所未有地置身于机遇与挑战交织、有利与不利并存的矛盾之中。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我们要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全面把握“危”与“机”的辩证关系，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采取切实有效举措，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促改革、抓落实”的重要作用，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不断

调整生产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增进全社会福祉。

三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量质提升。坚持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注重发展的前瞻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四是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鲜明时代特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通过改革的办法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不断释放数据、技术等要素潜能,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提升治理效能。

五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科学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资本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最活跃的要素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能够不断提升社会生产

力水平,推动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提升。要充分发挥资本健康发展对科技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调动资本助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同时,还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引导和监管,为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营造资本有序流动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六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推动政策组合落地发力。要坚持稳中求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有序推进“六稳”“六保”工作。积极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精准、可持续。要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保持政策调整的前瞻性,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防止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密切跟踪研判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加强政策储备,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选自2022年5月16日《经济日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韩喜平

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要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继续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

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由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决定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经济总量自2010年起位居世界第二,现已突破110万亿元大关。但是,越是发展起来,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越是取得发展,越是取得成绩,风险和挑战也会越多。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提出,一是要解决前期经济发展中尚未化解的困难和矛盾对当前发展的不良影响。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安全发展必然会遇到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累积的矛盾和风险已成为通往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亟待破解的问题。在面临风险和挑战时,如果未能准确识别、及时防范化解,就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直接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发展。但如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前一阶段“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成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就能妥善应对当前发展中机遇和挑战的重大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化危机为转机,赢得战略主动。

二是抵消国际经济风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现实环境下,各国经济呈现出新的不平衡性,地缘政治关系逐步复杂,给我国发展带来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交织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政治战略、经济霸权等因素考量,特别是美国始终坚持奉行“美国优先”战略,通过惯用的金融霸权和贸易霸权,极力遏制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同时,跨国垄断资本在持续扩张的过程中,对我国战略产业掌控能力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得国际游资一直试图寻求可乘之机来冲击我国金融体系,从而给我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因此,筑牢风险防波堤、织密经济安全网,推动实现安全发展,是应对当前我国发展外部形势复杂深刻变化的必然之举。

三是关联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着对安全的需要,同时美好生活的实现也需要安全为平衡、充分发展保驾护航。化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二者关系,保证人民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障人民能够享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中把握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在一些领域仍面临着严峻的

安全形势,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得市场主体经营困难、利润下滑问题都成为当前经济建设要面对的风险,这些问题关系着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关乎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因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的具体体现。统筹发展和安全本质上是要求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经济发展是一个包含内部各要素和外部环境的系统工程,从内部看,包括资本、技术、人力的组合,以及理念导向、体制机制等;从外部环境看,与社会安全、人的发展诉求、自然环境承载力、国际环境等皆有关系,必须统筹兼顾,秉持总体观和系统观。只有兼顾发展和安全,统一生产发展与社会安全,才能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才能推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就这层意义而言,统筹发展和安全蕴含着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也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和系统观的原则和观点,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与深刻的价值指向。

全面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深刻内涵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能不

能平稳地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首先就是要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既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目的。首先,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进步都是以发展为基础的,集中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己任,不断推动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从实现“全面小康”再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的“并联式”发展新路,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唯一性,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消除了众多潜在风险,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发展奇

迹。就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维护国家发展安全,必须从根本上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需要创新引领发展、科技引领未来,“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素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即“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问题,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国家安全工作的顶层设计,完善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持了国家安全大局的稳定,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塑造、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重要课题。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意味着安全不再简单地从属和服务于发展,而是成为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一个重大事项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随着安全对于发展意

义的凸显、安全在发展中的分量加重,把安全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更多地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兼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发展和安全没有孰轻孰重,不能将其割裂开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纵观历史,根据国内国际发展与安全形势的变化,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把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战略部署。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恢复国民经济发展与稳固新生政权,因而形成了“发展与安全并重”战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党中央领导开展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三线建设。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开始更多地被置于国家战略布局中的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做出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战略部署,坚持将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发展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以“统筹安全与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将安全上升到与发展相同重要的地位。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现路径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立足于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通过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环境,不仅明确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具体内涵,而且指明了实现路径。

以科学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思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具体而言,一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为维护安全奠定基础,通过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为推动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通过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整体的发展与安全,为世界安全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二是要正确认识、科学研判,牢牢把握当前发展和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预见、难以预见的风险点明显增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中央重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放眼

长远,坚持系统观念,应势而谋,决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以战略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辩证思维协调谋划,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正确认识、科学研判,牢牢把握当前的新变化,增强忧患意识、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防范化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安全风险。“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正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导思想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稳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努力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以行动合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是要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强化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领导,兼顾研判现实风险与推动社会发展并重,避免错误倾向,保证党在各领域发展中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持用党的领导引领国家安全工作的全过程,坚持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总体部署。二是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集成系统治理和科技创新的合力。优化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排除较大风险隐患,提高网络安全防控能力,有效应对有组织、高强度的网络攻击,从而有效保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安全,精准审度风险的萌芽期,及时止损,防止酿成更大的风险,从而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三是要培育并强化防范化解突发风险的机构、队伍和机制;横向维度上要在政府、社会、个人之间形成联动,综合提高各类风险的应对能力,纵向维度上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统筹协调机制,规范立法、加强执法,形成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选自2022年5月1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系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把握稳中求进的方法论

孙来斌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体现了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和智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原因的角度进行了深刻总结,强调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重要历史作用。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自觉把握稳中求进的原则要求,对于坚决贯彻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科学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坚持分析经济发展形势的问题导向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对于“问题”,毛泽东同志站在唯物辩证

法的高度深刻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对于一个引领方向、把握大局的执政党来说，能否及时发现并正确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那些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是体现其理论思维水平和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百年党史表明，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问题导向，将问题当作靶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为了解决经济领域现实问题、打开经济工作局面提出来的。

2013年11月，根据当时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和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面广，重大改革举措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可能越来越多。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把握大局、稳中求进。”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现实针对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挑

战空前上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增多、压力增大。从国际看,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从国内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发展质量问题突出,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党中央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出台了有效解决措施。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等问题,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重要要求。这一重要要求,深刻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

掌握“稳”与“进”的辩证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始终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由于每年面临的具体形势和任务有所不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具体要求和侧重点也会有所变化。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

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这一重要论述具有统领性、前瞻性。就当前而言,“稳”的重点就是稳宏观经济、稳民生保障、稳经济增长、稳社会大局,而“进”的关键就是要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把握好“稳”与“进”的辩证关系,推动两者良性互动。对此,可以从以下角度认识和把握。一是从前提和目的的辩证关系角度看。一方面,“稳”是基础和前提,不稳难有进。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进”就失去了基础和支撑,就可能是盲目冒进,难免会摔跟头。另一方面,“进”是方向和目的,有进才有稳。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进”,长期的“稳”就无法实现。离开了“进”而片面求“稳”,就会因为不思进取而失去稳定。二是从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的原理表明,运动和静止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对待经济工作,我们应自觉运用运动与静止的辩证法则,既要注重经济社会运行的前进性,也要注重经济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力求稳中求进。

“稳”与“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个中道理就如同骑自行车时的平稳与行进原理。只有保持相对平稳,自行

车才能顺利行进；而实现顺利行进，反过来又有助于保持动态平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总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当前，贯彻“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认识和把握“稳”与“进”的辩证法，突出稳定的当先地位，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在实现更周全的“稳”与更高质量的“进”的良性互动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把握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的“时度效”

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这说明，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在现实条件面前并非无可作为，而是可以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及时转化不利条件。做到这一点，就要善于把握时机。事物具有质、量、度三个方面的规定性，而“度”作为保持事物质的数量界限，体现了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在实际工作的方法论上，把握适度原则，就是要在坚持事物本质的前提下实现发展，并在丰富发展中使事物的本质得到更好坚持。时机把握是否得当、适度原则运

用如何,会体现出不同的效果,而检验效果的根本标准无疑就是实践。

从哲学层面讲,稳中求进是质量互变过程中的量变形态,是经济社会发展在量变范围以内的现实表现,也是度的范围以内的发展变化。就现实而言,稳中求进要尽量避免政策调整上的大开大合、经济发展上的大起大落,要着力追求平稳的经济发展、良好的社会成效。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久久为功。战术上要抓落实干实事,注重实效,步步为营,一仗接着一仗打。”这就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讲明了如何做到稳中求进。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这就从时、度、效的哲学高度阐明了把握稳中求进的重要方法。

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我们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保证大局稳定,才能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取得好的实践效果。这里的“因势”“应势”“顺势”,体现的是对客观规律性的尊重;“而谋”“而动”“而为”,强调的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简言之,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

打,保持谨慎从事、谋定后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积极进取的方针,不是消极怠慢的方法,它要摒弃和避免盲目冒进和不思进取两种错误倾向,要求和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和工作耐心,“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实现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保持整体谋划和重点把握的有机统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落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重要要求,既要注重整体谋划,又要做好重点把握。

系统观点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注重整体谋划,必须坚持系统观点,全面系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落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应避免孤立的“单打一”,而要打协同的“组合拳”,增强各项政策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注重整体谋划,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坚决执行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确保不偏

向、不变通、不走样。

做好重点把握,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牵住“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抓民生始终是一个重点。保民生就是保稳定,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因此,做好民生工作,是稳人心、稳大局的重要基础,也是扩大国内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同时,内需潜力大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要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注重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结合部分发力。而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保障初级产品供给、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无疑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选自2022年5月13日《光明日报》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欢迎订阅 2021 年 《学习活页文选》合订本



定价:500元(共四册) 联系人:刘亮 电话:010-66062773(兼传真)

学习活页文选

银行汇款如下

- ◆收款人:《党建》杂志社
-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琉璃厂支行
- ◆账号:0200008009004616486
- ◆行号:102100000802
- ◆请把汇款人单位、收件人及订刊份数告知发行部

邮局汇款如下

- ◆邮政编码:100062
- ◆收款人:《党建》杂志社
- ◆详细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0号东段

《党建》杂志社编辑出版发行
编辑室:(010)67028282
发行部:(010)66062773
(010)66063971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0号东段
邮编:100062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价:2.00元 全年定价:108元

邮发代号: 82-2

刊号: ISSN 2095-0888
CN11-6009/D